

目 录

- 一 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反复的斗争 1
- 二 駁斥“党不懂经济规律”的謬論 17
- 三 妄想否定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劳动价值論 23
- 四 为资本主义世界粉飾太平——
(一)妄图修正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貧困化理論 36
- 五 为资本主义世界粉飾太平——
(二)妄图修正馬列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理論 47
- 六 对“农业合作化太快了”謬論的批判 61
- 七 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二种形式及其性质的反动
观点的批判 68

一 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反复的斗争

反右斗争至今已有一年多了。在这不长的时期中，我国各条战线上都创造出数不尽的奇蹟，形成了经济和文化的全局大跃进，这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地发展，主要是由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而正确的领导下，通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了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过程中，一方面打退了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另一方面，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从而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而无限的前途。

党和毛主席不止一次的教导我们，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在1957年的进攻虽然被击退了，但是以后一有机会，他们还会兴风作浪。同时，右派分子所散布的反动言论也还有一定的市场，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存在着。因此，对资产阶级右派必须进行长时间的反复的斗争，才能取得这一斗争的彻底胜利。我们编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也

就在于通过对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的批判，使人們更深刻地認識这些右派謬論的反动性和修正主义的本質，从而有助于消除右派所遺留下来的毒素。

去年，上海財經学院和华东紡織工学院的教师 and 全市政治課教师一道，对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展开了尖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清除了馬列主义理論队伍中的两个敗类。右派分子王士章（原上海財經学院国民經济史教研組教員）、楊思正（原华东紡織工学院政治經济学講師）和全国其他右派分子一样，由于他們一貫地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乘党整风的机会，披着伪装，打起“招牌”，兴风作浪，顛倒是非，向党猖狂进攻。王士章和右派分子吳承禧一向有密切联系，而楊思正又是王的“知心”密友，平日互相标榜，互通声气。在鳴放开始时，他們估計形势，認為时机对他們有利，要“出头透气”了，更进一步地勾結起来，对党連放毒箭，詆毀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猖狂地抨击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使資本主义制度死灰复燃，使資产階級学术思想乘机泛滥。

右派分子进攻的目标，首先就是党的领导。关于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保証，因而是右派分子所深恶痛絕的。王士章、楊思正当然也不例外，他們为了打击党的威信，破坏党群关系，从而使党陷于孤立，极尽挖苦地辱罵党員、团員和靠攏党的积极分子。他們把担任負責工作的党員同志污蔑为“老爷”、“官們”，而把自己称为“老百姓”；还把党团員譏刺为“特权階級”和“运动員”，而把积极分子說成是“应声虫”和“保皇党”。他們的阴谋，

显然是企图把党员和国家的干部与群众对立起来，并曲解成为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借以混淆视听，分裂党群关系，破坏团结，以达到他们反党的罪恶目的。

他们对党选拔干部所一贯遵循的德才兼备而以德为统帅的原则，进行了恶毒的诋毁，他肆口漫骂说：“对党员无才便是德，”对他们自己来说，“有才便是德”；并且叫嚣说，他们是“大才小用了”。

谁都知道，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除了为人民的利益而艰苦严肃地工作以外，并无任何私心。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党的全部主要骨干都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前仆后继，坚贞不屈，其革命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之高，是许多人所难以想象的。可是右派分子却从他们自己的头脑中拿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官们”的丑恶头衔，强加在党员干部的头，这完全是一种恶毒无赖的行为。道理是显明的，因为党团员和党的干部是具体贯彻党的领导意图和执行着党的政策的，而积极分子又是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因此，右派分子总是从打击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入手，来动摇党的领导。

我们所选拔的干部，是作为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驯服工具，注意政治条件是绝对必要的，不这样就要犯重大的错误。对于阶级敌人来说，这当然是他们所反对的。他们所谓的“大才”，实际是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如果把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当作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驯服工具，那简直是笑话了。

这还不算，王士章、杨思正的反党领导，更赤裸裸地

表現在“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丘八不能領導丘九”等謬論上。他們在鳴放中大肆宣揚“民主辦校”和“教授治校”的邪說，並且認為只有“教授有高度科學文化水平，才能办好學校”。他們一方面詆毀黨委領導下的高等學校不“民主”，另一方面污蔑“黨員不懂業務，不能領導高等學校”。他們的陰謀，顯然是企圖以資產階級的“教授”、“專家”，來代替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的教育方向。對科學研究方面也是如此，他們污蔑“現在的社會科學水平不高，是由于黨管的太緊，妨礙了思想”；又說“馬列主義窒息了科學研究”；因而竟異想天開地提出“科學應當開辟自由市場”等謬論，借以取消黨對科學方面的領導，使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泛濫橫流。

我們認為，文教科學要不要黨的領導，並不是一般的學術爭論問題，而是一個具有根本性的政治方向和路線的鬥爭。我們的教育是社會主義的教育，沒有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教育是不能設想的。教育是改造舊社會和建設新社會的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必須在黨的領導之下，才能很好地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一切剝削制度的殘余服務，為消滅城市與鄉村的差別和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為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服務。因此，一切教育行政機關和一切學校，應當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資產階級的“教授”、“專家”是沒有資格來領導這樣的教育事業的。我們的科學，無論是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是服從於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科學，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原則的科學，而對於那些反動的、腐朽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必須進行徹底地揭發

批判。这当然也不能讓資產階級的“內行”人來領導。事實上，幾年來我國的文教科學事業，正是由於黨的正確領導，走群眾路線，才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局面。右派分子的反黨的這塊“招牌”，完全被事實徹底粉碎了。

右派分子對黨關於知識分子的政策，也加以猛烈攻擊。他們叫囂說黨不尊重知識分子，因此，“當今出不了人才，就是出了人才也不會被重視。”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抬出了“文明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里的羅斯福和封建王朝中的唐太宗。王士章說，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親自登門拜訪愛因斯坦，在英國，科學家牛頓的威信比女王還高，在英美等“文明國家”里，知識分子受到“尊重”，因此才出現了很很多的天才科學家；中國歷史上的唐太宗能夠禮賢下士，因而出現了諫議大夫魏徵等人。而現在則是“官比知識分子重要”，所以既出現不了“青年科學家”——牛頓，也出現不了“諫議大夫”——魏徵。那就是說，黨和政府埋沒了他們的“人才”，限制了他們的讒言蜚語。因此，他們叫囂要改變知識分子的“地位”。

右派分子羨慕所謂“文明國家”，替反動統治階級吹噓捧場；同時對新中國的一切加以歪曲污蔑，這些本來是不足奇怪的。在反右鬥爭中，已經被我們駁斥得體無完膚。問題是：他們為什麼高喊要改變知識分子的地位？企圖何在？必須予以揭發。

解放以來，黨對知識分子一貫進行着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充分地發揮他們的作用，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知識分子的物質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政治地位方面也起了很大

变化。象党这样的重视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从来找不到的。同时，为了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的学术文化，以适应建设发展的需要，党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此把学术文化推向了新的革命阶段，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忠于社会主义的青年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等，正在大批地成长起来。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也积极向党靠拢，争取彻底改造自己，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事实俱在，人所共睹。但是右派分子竟歪曲事实，进行污蔑，并叫嚣要改变知识分子的地位，这没有别的，只是要知识分子不接受党的领导，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恢复“劳心者治人”的地位，做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而已。

王士章、杨思正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也提出了“三害”（三大主义）的根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王士章说，我国的行政和管理制度即民主集中制，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存在”决定意识，要根除“三害”，就必须“改革”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整风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杨思正又认为“民主和集中是矛盾的，强调集中必定使民主受到限制，民主和集中说起来是矛盾的统—，实际上统—不起来。”他们都认为“民主集中制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因为强调集中，实际形成培养下级对上级的机械服从，明明有意见，由于集中而受到限制”，而“无条件服从上级就是盲从。”

以上只是王士章、杨思正在鸣放中对我们的政治制度所进行的歪曲污蔑的几个例子。根本的问题是他们都极力反对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也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替腐朽的資本主义各种制度，大事鼓吹。我們都知道，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同生产資料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它們是剝削制度的必然产物，是剝削阶级的一种本性。因此，三大主义是旧社会的普遍現象，要鏟除它們就必須首先消灭产生它們的旧制度。正因为这样，所以旧社会的統治阶级从来不敢提出反对三大主义的号召。在新社会中，虽然有的时候在有的地方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但是这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无关。因为在这里，没有产生三大主义的經濟原因；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非但不是三大主义产生的根源，相反地，却是鏟除三大主义的有力工具。但是右派分子却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他們首先丑化人民民主制度，宣布它的“罪状”；然后就否定它，說什么这样的制度要不得，歪曲地說人民民主专政是三大主义的根源，这样的結論当然是：只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才能消灭三大主义。另外还有一面，那就是，把資本主义烘托出来，請它乘机复辟。这充分地暴露了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

右派分子把民主和集中绝对对立起来的謬論，更是极端錯誤的。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呢？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教导我們：“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紀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

矛盾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应当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所以我們主張的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就是我國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有了這樣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充分發揮全國人民的政治一致性，才能顯示出全國人民利益是共同的、意志是統一的，才能實現全國高度的統一領導，並且消除過去處在被壓迫地位的時候的“一盤散沙”狀態。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也是維護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如果沒有統一集中的領導，我們就不會取得社會主義事業的輝煌勝利。國家的統一領導，並不排斥地方的主動性；國家機關、企業和學校實行民主集中制，也不會限制群眾的積極性及其民主生活，相反地，它使群眾的倡導精神得到充分發揮，民主生活不斷擴大，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迅速發展。通過整風，在國家生活廣大範圍內，已經出現了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因此，憲法第二條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這一人民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是絕對不容污蔑或否定的。

右派分子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同時，還反對蘇聯。因為

苏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鋒和堡垒，是第一个冲破了资本主义的鎖鏈并建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象一座灯塔，照耀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走向自我解放的革命道路，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前方和后方，这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右派分子所最憎恶的。王士章、楊思正由于厌恶苏联，极力地貶低苏联四十年来建設的偉大成就和所造成的影响，說什么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美国工人低的很多。”并且捏造騙人的証据，說“苏联人民平均工資只有 300 卢布，但一斤猪肉就要 30 卢布。”这样的騙人手段，稍有常識的人都不会相信的。苏联不但在發展重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發展輕工业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比拟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色之一。苏联人民不但早已消灭失业现象，他們的平均工資在 1,000 卢布左右，而 12 个卢布就可以买一公斤猪肉。他們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相反的，美国的失业者已超出了六百万人。右派分子的欺騙捏造，一拆即穿。

不但如此，他們对苏联的文化科学事业也濫加詆毀，硬說“苏联文化科学水平不高，只有普及而沒有提高”。并且說“在学术上沒有搞出什么东西，只出了些小冊子”。这些謬言更是荒唐可笑，不值一駁。在东风压倒西风的今天，我們但叫右派先生們抬头看看环繞地球的大福星，談談洲际導彈的制造成功以及其它方面惊人的发明創造，就連他們的崇拜偶像——帝国主义的头面人物，也不能不望而生畏的說：“文化科学苏联領先了！”那末，这些吠影吠声的右派，还有什么可講的呢？

王士章、楊思正不但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攻击,并且披着“馬列主义”的外衣,举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一方面宣揚和販賣修正主义,另方面对党的思想基础——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歪曲。他們任意地割裂馬列主义,說什么“馬列主义实际上有三种,第一、馬恩列毛的言論是理論,是馬列主义,个别理論上有出入沒关系;第二、馬恩列毛的一字一句不能抵触,否則就不是馬列主义;第三、不但馬恩列毛的一字一句不能抵触,而且高級首长的言論、人民日报社論也不能抵触。”并且說:“馬恩列的言論是馬列主义,修正主义也是馬列主义”,除此以外,“可以百家爭鳴,斯大林說的話不算。”他們認為“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有出入沒关系,很多論点已經过时了”,因此又揚言“对行动中的馬列主义不相信”,而“同意修正主义”。

够了,从以上这些极端反动的謬論,就充分地暴露了右派分子阴險恶毒的本質。首先,他們除了抹杀斯大林同志的功績以外,并且用“一字一句不能抵触”来含沙射影地詆毀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从而挑起人們对馬列主义的怀疑,以便动摇党的思想基础。他們极力反对首长的言論和人民日报社論是行动中的馬列主义,企图把有偉大生命力的馬列主义僵化起来,以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我們知道,党和政府的負責同志的言論和人民日报的社論,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經驗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馬列主义在我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們代表着党的方針政策和路綫,离开了在实践中的运用,就等于不要革命和全部否定馬列

主义。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他們說“人民日报沒看头，是正統派，”我們的理論工作是“跟着党的方針政策兜圈子，缺少創造性”，用来挑起人們对党的方針政策的怀疑和反对。

其次，右派分子揚言“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有出入沒关系，很多論点已經过时了。”他們所說的可以“有出入”的“个别原理”是指着些什么呢？主要的是：否定馬列主义关于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的理論；否定馬列主义关于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理論；并且明目張胆地抨击馬列主义理論的基石和灵魂——“劳动价值論”，說它只“适用于手工工場时期以前”。因此，他們甚至說“政治經濟学沒有學头，深入下去也沒有什么东西。”王士章、楊思正关于詆毀馬列主义政治經濟学的謬論并不止于以上这些。本书已另有专篇文章，作了全面而透彻的駁斥，这里不必多談。但是，对于右派分子提出这些謬論的阴谋目的，必須予以揭发。

我們都知道，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馬列主义政治經濟学是一門具有階級性和党性的科学，是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为摆脱資本主义压榨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揭露了資本主义剝削的实质及其內在的种种矛盾，从而說明資本主义衰亡与社会主义胜利这一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的必然性。因此，在一百多年以前，当这門偉大的社会科学出现在学术思想領域中的时候，資产階級經濟学的实质，便赤裸裸地被揭发出来，而好象在阳光照射下的冰雪，开始融解而沒有科学性之可言了。到了現在，資产階級經濟

学不但是沒有科学性，并且早已成为极端反科学的东西。但是那些“逐臭之夫”的右派分子，却象苍蝇滚粪丸似的，对它死啃不放，而对科学的馬列主义政治經济学則极力加以歪曲、否定，并詆毀說“很多論点已經过时了。”这沒有别的，只是充分地表现出右派分子对这一門作为馬列主义思想武器的科学，是如何的憎恶和畏惧。他們怕見这門科学放射出的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光芒，感到資产阶级反动理論的破产，因而引起他們从思想深处流露出的厌恶。

从这可以清楚的看出，王士章、楊思正傳播各种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謬論的阴谋目的，正同其他一些右派一样，是企图用修正主义来代替或取消馬列主义，是企图在学术思想领域中，推倒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篡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而使反动的資产阶级学术思想，乘机泛滥。因此，王士章、楊思正的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不是一个学术思想問題，而道道地地是一个政治問題。

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的現代修正主义“論点”，表现得非常突出。他們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基本原则，誹謗为“教条”，而他們所攻击的最根本的“教条”，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們同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口吻一样，恶毒地誣蔑无产阶级专政，說它是造成“三害”的根源。他們一方面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說它是“过了时的”，也就是說，目前它对于社会发展已經丧失了意义；另一方面詆毀党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和“不懂辯証法”，而他們自己却自称是“百分之九十的馬列主义者”。

右派分子不但从左边来攻击我們，說我們是“教条主义”者，并用来污蔑党、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陣营加以丑化；并且从右边来攻击我們，說我們的社会主义不如資本主义，而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陣营則加以美化。他們为了替壟断資本辯护，竟否定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基石——劳动价值学說；否定資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階級絕對貧困化的理論，否定資本主义社会經濟危机的必然性等。他們的阴谋目的显然是企图模糊无产階級的階級意志，解除无产階級的思想武装，使它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而走向資本主义道路。

我們知道，資产階級破坏无产階級的革命斗争，历来不外用两种手段：一种是暴力鎮压；一种是欺騙。現在，在我国广大工人階級掌握政权的形勢下，一小撮右派分子当然只能用詭辯的欺騙論点，来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破坏他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腐蝕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否定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必要性，否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取消民主集中制，从而使腐朽的資本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复辟。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教导我們說：“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种資产階級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因此，我們对右派分子修正主义的“論点”，必須进行毫不調和

的批判。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因而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反映了新兴的社会力量同垂死的社会力量的尖锐的斗争；对世界范围内来讲，也反映了帝国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锐斗争。我们绝对不容许右派的修正主义遗毒，潜伏在革命的阵营里面。

王士章、楊思正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王士章、楊思正都生长在资产阶级的剥削家庭，从小就受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教育，这在思想上已经给他们扎下了反动的根子。王士章十二、三岁时就欣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在中学读书时作文常用“希特勒万岁”为歌颂口号。1945年前后，王士章参加了反动的三青团，同时也开始传播他的反动言论，污蔑并辱骂共产党和八路军，甚至主张消灭共产党。当然，在反动统治时期，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解放以后，王士章非但没有很好地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相反地，对党对人民更加仇视，以至发展到狂妄而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都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革命队伍中的逃兵。王士章于195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东北工作，但是他认为在这里不能发挥他的“才能”，竟不愿工作需要而擅自逃跑未成。但终于1952年辞职回到上海，并自动脱离了青年团的组织关系。楊思正是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但在以后的短短四年当中，曾先后两次借故回家，成

了革命队伍中可恥的逃兵。党为了給于他們悔改的机会，后来重新吸收他們参加工作。但是他們对自己的錯誤行为并未作認真的檢討，从中接受教育，反而对党对政府不滿，甚至变本加厉，散布反动言論，恩将仇报。

王士章、楊思正一向自高自大，目空一切，自命是“馬列主义者”，自詡是“才华”之士，看不起任何人。因而他們从来不接受別人善意的劝告和幫助，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們不但沒有自我改造的自覺性，而是厌恶、拒絕思想改造，頑固地堅持着反动的政治立場和資產階級思想。他們的反动思想，同馬列主义、同社会主义、同党和人民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一有机会就頑強地表現他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因此，在大鳴大放的时候，傾洩一貫的反党仇恨，作全面的猖狂进攻，終于彻底暴露了他們的右派面目。这就是王士章、楊思正墮落成右派分子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

我們知道，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是彼此呼应，沆瀣一气的。如果我們把全国各地右派的反动謬論綜合在一起，可以發現出他們是一脉相承、語言共同和目标一致的。这种物以类聚的情况，当然是由于他們的反动階級本質所决定的。他們都极力抨击、污蔑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領導，反对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同时，則鼓吹恢复資產階級社会科学，为資產階級学术思想的泛濫和資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开辟道路。所以，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和思想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

由于这样，我們現在編写这本小冊子，其意义就非常重要

了。本来，王士章、楊思正不过是右派中的走卒，可是在向党进攻中，却成为馬前的悍将。他們除了“言伪而辨”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才华”可言。現在，他們的反动言行已經是被彻底的粉碎了。但是他們的罪恶言行对某些人却还有一定的迷惑作用，也就是說，还有它們的“黑市”；同时，他們的謬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它右派相联系、相呼应。因此，我們就不能把王士章楊思正的右派言論，看作只是他們两个人的謬論，而应当看作是整個右派的謬論；也不能把这本小冊子認为只是对他們两个人的批判，而应当認为是对所有和他們抱有同样观点而在思想上起共鳴的人的严肃批判；并且使那些受右派迷惑的人們，迅速警覺，以免誤入歧途。

毛主席教导我們說：“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争，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因此，我們必須时刻注意这些反面教員的言行，必須准备进行长時間的反复的斗争。

二 駁斥“党不懂經濟規律”的謬論

“党不懂經濟規律，根本沒有好好研究價值規律的作用，企圖用行政命令來代替價值規律，結果弄得買肉、買草紙、買日用品總要排隊。”這是右派分子王士章為了想使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向党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毒箭之一。在他這些帶有惡毒污蔑的語言里，使我們不難看出他內心的掙扎：他對黨對社會主義是懷著極其深刻的不滿和仇視；對資本主義却寄予無窮的希望和留戀。

黨究竟懂不懂經濟規律？除了別有用心的人以外，都會承認只有無產階級的政黨才能真正懂得經濟規律這一客觀事實。誰都知道，我們黨是以馬列主義所武裝起來的黨，辯證唯物主義就是我們黨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一直認為客觀世界是按其本身固有的規律向前發展的。而這些規律又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的東西，人們只能發現、認識、運用這些規律，而不能任意改變、廢除和創造這些規律。與此相反，一切非馬列主義者總是否認或者是歪曲客觀規律這一事實，他們把社會生活發展中的規律性不是歸結為偶然事物的巧合；就是歸結為某些英雄人物意志的表現。所以，究竟懂不懂經濟規律，首先就應當看他是不是承認客觀存在着規律。我們認為資本主義最終必然為共產主義社會所代替，這是為社

会发展规律所决定了的，可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不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妄想阻止历史车轮前进，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其结果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的。所以不懂经济规律的不是党而是包括右派分子王士章和楊思正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派。

再则，我们党不仅承认客观存在着规律这一事实，而且只有我们党才能够最深刻地最客观地来认识和运用这些规律。大家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它的利益是与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的，所以，它是最革命的阶级，对事物的认识不存在着阶级局限性，它是能够最客观、最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一切规律的。工人阶级愈是彻底地为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就愈能促使社会按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发展，所以，共产党的特征就在于：它在自己一切革命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紧紧地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首先是经济规律出发。并依靠这些规律，自觉地运用它们来为人民谋福利。这样，我们党在自己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就反对不从实际出发的一切主观主义行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一直贯穿着反“左”右倾的斗争。只要稍具有历史知识的人，他总会知道这一事实。因此，行政命令等一切主观主义作风，是与党本身根本不相容的，但王士章偏偏闭着眼睛说，“党以行政命令来代替价值规律”，这分明是对我们党肆意的污蔑和恶毒的攻击。

党究竟懂不懂经济规律呢？现在我们让事实再来讲讲话

吧！我們黨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農村到城市這樣一個發展過程。發展到現在，我們黨已成為全國人民最愛戴的領導者了。它正滿懷信心地、英明地領導着全體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把中國引向到一個更加繁榮、更加富強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在解放後短短幾年來，我們在各方面都取得偉大的成就。大家知道，當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取得勝利的時候，我們所面對着的國民經濟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肆破壞之後，又受到國民黨的洗劫和美帝國主義的掠奪，以致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但是我們僅僅花了不到三年的功夫，就使國民經濟恢復到戰前的最高水平。在這同時，並制止了國民黨所遺留下的十二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並完成了農村土地革命運動，解放了生產力。於1956年底，我們又取得了對農業和手工業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決定性的勝利，從而又進一步地解放了生產力，現在我們農業正健康地向着人民公社形式發展。這些勝利的取得，正是由於我們黨掌握和運用了客觀經濟規律、首先是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結果。如果以目前事實來說，更證明右派分子是一片胡言亂語，例如：今年我們在全民整風的基礎上，出現了全面大躍進的局面，在農業各類作物方面都獲得大面積豐收，全國糧食產量將達七千多億斤，全國棉花將達七千萬担，比去年都增加了一倍以上，這種高速度地增產，不僅在我國歷史上而且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空前的。我國糧食問題已基本上得到了解決，但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今年我國農業生產是在沒有大量的農業機械化和化學肥料的情況下增產的，在工業方面，同

样以惊奇的速度前进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就使鋼由 135 万吨增加到 535 万吨。目前全国人民正鼓足干劲，为实现党中央关于把鋼产量翻一番的偉大号召而斗争。这些偉大的成就，难道是党不懂经济规律而能实现的嗎？不！决不是！相反地说明，正是由于党正确地掌握了客观经济规律，才能够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从而获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右派分子王士章特别攻击我们党不善于利用价值规律。大家知道，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的要求，商品的价值量必须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所决定，并且按照社会必要劳动量进行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仍然可以利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我国解放初期以至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前，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个体经济的小商品生产者，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对价值规律的認識和运用，对我们实践活动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解放初期，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还不够壮大，还没有来得及消除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市场的混乱状态，因此，价值规律还能够自由泛滥地起作用，一些资本家曾利用了这机会，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进行投机活动，造成人为的供需脱节，引起物价波动，党及时采取了以固定价格抛售大量商品的有力措施，对当时稳定市场，打击投机活动，对不法资本家的进行斗争，曾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自发性，国家不可能用计划来直接调节它的生产，我们党就利用价值规律，制订了正确的价

格政策，把它們納入國家計劃軌道，例如，黨和國家正規地調節了棉糧比價，從而達到增產棉花的目的。為了國家積累資金和爭取外匯，我們曾提高烟、酒和呢絨的價格，來限制它的消費量，同時，我們為了保證一些主要生活資料的供給（如棉花、糧食等商品），曾採取了統購統銷，使這些商品擺脫價值規律的支配。大家知道，價值規律能使商品生產者兩極分化，促使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所以列寧曾說過：“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並大量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我們黨在日常經濟活動中，正確地估計到價值規律這一作用，我們曾通過商業、收購、供應、價格信貸等途徑，來割斷小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的聯繫，加強了社會主義經濟對它的領導，促進它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同樣，在我們對資本主義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收購的時候，也充分運用了價值規律；例如：在加工的工繳上，收購產品的價格上，生產成本核算上，都分別採取了適當的價格政策，來實現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目的。以上事實說明，黨不是不懂價值規律，更不是以行政命令代替價值規律，而是充分地認識了價值規律，巧妙地運用了價值規律，限制它發生作用的範圍，並把其破壞作用引導到另一方向，來為我們社會謀福利。

既然如此，右派分子王士章一番苦心實質何在呢？從他隱晦的語言里，現在已使我們不難看出：他是否認黨的領導，把黨對經濟領導降低到無能的地步，甚至連價值規律都不懂。另一方面，他是詆毀社會主義制度，在人們中間造成一種感覺，好像排隊現象，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從而否定計劃經濟的優

越性。既然党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不行，言外之意当然不言而喻了，那就是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够理想。这就是王士章的心内之言。

我们并不讳言，在我们经济生活中曾出现过某些商品排队购买的现象，这是由于人民收入的增长，生产一时赶不上需要，或者是出于我们在某些环节上一时还缺乏经验。这是前进中的困难，这是暂时的现象。但这绝不是由于党不懂经济规律的结果；更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所造成的。

必须指出，社会总是按其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的，任何人都阻挡不住历史车轮的前进，不管右派分子如何狂吠，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终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

三 妄想否定馬列主义政治經濟学的 基石——劳动价值論

否定馬列主义的基本理論是右派分子楊思正在向党进攻中的一支毒箭。“劳动价值論过时了”是这些反动謬論中的主要点之一。右派分子楊思正說：“劳动价值論只适合于手工工場以前时期，大机器生产以后，很多問題已不能解釋。”他的論据是：“大生产以来，劳动作用愈来愈小，价格与价值的距离愈来愈远，壟断前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壟断时期按壟断价格出售了”，而且他說：“馬列主义很多論点过时了，現在我們还講五十年前的馬、恩理論是違背现实和良心的。”

劳动价值論是否只适用于手工工場时期，在大机器生产以后就“过时了”，从而應該由“机器价值論”来替代它呢？是否我們現在講劳动价值論，就是講五十年前的馬、恩理論，是違背现实和良心了呢？

我們說，劳动价值論是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之一，不管是手工劳动时期，还是大机器生产时期，只要有商品生产存在，都必須进行交換，从而它們必須具有一种同質的东西，那就是由劳动所凝成的价值，以此作为比較的基础。否則，就无法进行比較，交換也就无法进行。那末，这种同質的东西是否象右派分子所說的那樣，在大机器生产下，机器作用愈来愈

大,劳动价值論已經“过时了”,因而,不再是劳动,而是机器等生产資料了呢?完全不能得出这样的結論!价值,作为商品中的同质的东西,只可能是由劳动形成,而不可能由机器等生产資料来形成。誠然,机器等生产資料,可以成为新产品价值的一个构成部分,但这仅是从机器等生产資料被当作为过去劳动的凝固体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說,从它是一种物化劳动,即旧价值的角度来看,这种价值是会随着机器等本身的被有效运用而轉移到新产品中去。至于从机器等生产資料的使用价值角度来看,那末,經過劳动过程后,使用价值的旧形态被消灭了,而成为一个新的使用价值形态,但它們决不构成为新产品中的同质的东西。不过,由于其中机器等設備的使用价值的持久性,它不是一次被消耗,而是在一个长时期中被运用着,因而,把它作为价值来看时,即把它作为物化的过去的劳动来看时,就决定了其价值是逐漸的轉移,而不是一次的轉移到新产品中去的。退一步說,如果一定要将机器設備等使用价值本身作为形成商品中同质的东西,就必须使得构成产品的其他要素,如原料和劳动,也能化成与机器相同的单位,否則,商品就无法进行比較,交換也就无法成立;但这又如何可能呢?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間,不能換算、不能比較(更不要說,机器本身就有許多复杂的种类,如何把它們划一的問題了)。既然这样,在商品交換过程中衡量和比較的基础,当然就不能是机器了。右派分子楊思正不敢面对事实来分析,事实清楚的告訴我們,在一切产品的形成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劳动,这在大机器生产下也不例外。沒有劳动,就不能創造出任何东西;沒

有劳动，光有了机器没人去发动它，是不能做成产品的；同时，机器等劳动手段和原料也不外乎是过去劳动的结晶。所以，劳动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基本的东西，它是商品中用来相互比较的唯一的同质的东西。因而，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劳动。劳动价值论是决不会过时的。右派分子楊思正所说的“劳动价值论只适合于手工工场时期，大机器生产以后，很多问题不能解释”，乃是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达到其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企图。

楊思正如此明目张胆地否定劳动价值论，其用心所在，就是企图以这些谬论来进一步否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因为既然劳动价值论在机器大生产时代已经“过时”了，价值是由机器“创造”的，那么就必然得出结论：剩余价值也是机器所创造，资本家不再剥削工人了？！

上面我们已经从价值，它是商品比较的基础就必须是同质的东西这一点来论证了价值不可能由机器形成。那末，剩余价值，它是整个价值中的一部分，即作为垫支价值的超过部分的价值，当然，也不可能由机器带来的。虽然右派分子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如说，“创造一架机器所花的劳动时间小于这机器能够使用的时间，因此，机器的采用可以带来剩余价值”；又说，“个别企业采用先进机器来生产时，可以得到比一般企业更多的剩余价值，也即超额剩余价值，这总应该是机器带来的，而不是劳动带来的了”等等，以这些谬论来论证剩余价值是机器创造的，进而反过来证明其“机器价值论”和污蔑劳动价值论“过时了”。但是，这些谬论经不起一驳：机器果然

是給資本家帶來剩餘價值和超額剩餘價值的一個必要條件，但這並不等於說它是帶來剩餘價值的源泉。因為機器離開了人們的勞動是死的東西，沒有人們的勞動去推動它，就等於廢物。所以，使用機器而帶來的剩餘價值，不能認為是機器創造，而是人們的勞動形成了價值，並給資本家帶來了剩餘價值。再說，機器的使用時間大於其製造時間，是否能帶來剩餘價值呢？我們知道，機器的使用時間的長短是其使用價值實現的問題；這種使用價值的實現本身，就是作為一種勞動手段，它在資本主義下，僅僅作為給資本家帶來剩餘價值的一個必要條件；所以，它並不能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當然，這種使用價值持續時間的長短，對機器本身價值的轉移到新產品上去有一定的影響，它決定了在單位時間內機器全部價值中有多少轉移到新的商品上去；轉移到新商品上去的價值有多大，就在商品賣出後，收回同樣大小的價值（在符合於社會上消耗的必要量時），因而，在這一點上，並不產生帶來剩餘價值的問題。至於採用新機器而得到的超額剩餘價值，也不是機器帶來的；因為，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而不是由個別勞動時間來決定的。而且，在採用原來機器（或是手工生產）條件下的勞動與在採用先進機器條件下的勞動是有所不同的；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採用了先進機器進行生產，從整個勞動狀況來看，就必須由具有較先進技術的勞動，或是較熟練的勞動來發動這些機器；這種較熟練的或具有先進技術的個別勞動時間，能夠折合成為更多的代表社會一般技術水平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以，超額剩餘價值的源泉仍然是勞動。先進

的机器仍然只是一个带来更多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它本身不能创造出什么超额剩余价值来。

这里，我們反問楊思正：首先，如果机器的使用能够创造价值，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話，試問：有那一个生产机器的資本家愿意把他的机器卖出来呢？假如机器真能給資本家創造无穷无尽的剩余价值；那末，生产机器的資本家就不会将其机器出賣，而要把它們积存堆貯在自己的倉庫里，讓它們“自我創造”巨額的剩余价值了。难道有这样好心眼的資本家，自己可以利用来发财的机器不去利用它，而讓渡給其他資本家去发财嗎？其次，如果机器能够創造剩余价值，那末又为什么在劳动力低廉的情况下，資本家往往采用手工劳动的方式进行生产，而不去采用机器呢？举个例來說，如果一个皮鞋厂，在原来手工劳动的时期，100个工人每天能生产出200双皮鞋，出售后，可得3,600元，其中生产資料化去2,400元，工資400元，(假定工人一天的工資是4元)，剩余价值就是800元。現在，如果采用一种新机器来生产，50个工人一天就能生产出200双皮鞋来；这时，工人每天工資假定仍是4元，但做成200双皮鞋所消耗的生产資料，由于采用了机器，在加上机器的消耗后，增加为2,700元的话，結果怎样呢？資本家的剩余价值减少了100元。在这种情况下，唯利是图的資本家当然不会去采用机器来生产了。这情况也不仅是我們举例說說而已，在现实的生活里多得很，如在美国通用汽車公司所属的某些工厂的生产工段中，还完全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又如，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許多企业中，許多繁重劳动都还是由

手工操作的，旧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里使用的是报酬很低的黑人劳动力以及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这里，清楚的表明了这样的问题，即剩余价值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显然，它不是由机器创造出来，如果机器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那就不会发生不用机器而用手工劳动的情况了。

由此可见，无论把商品怎样翻来复去，怎样去寻找那些所谓“理由”，都得出机器创造价值的结论来。而杨思正妄想否定劳动价值论，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竟至歪曲现实、造谣惑众之地步，对此，我们必须彻底粉碎他的种种修正主义谬论！

首先，“大生产以来，劳动作用愈来愈小了”吗？

事实完全相反，无论我们从具体劳动分析，还是从抽象劳动分析，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具体劳动看，我们知道，具体劳动就是指我们利用一定的工具，合乎目的的改变劳动对象，创造出一定的使用价值。在大机器生产时，由于利用了机器，使得劳动作用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能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来；因此，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使得劳动的作用愈来愈大了，与右派分子所说“劳动作用愈来愈小了”恰恰相反。当然，在这里，我们一点也不否定是由于利用了机器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但这与“劳动作用愈来愈小了”的说法是根本对不上号的，并不能由此来证明是机器创造了这些使用价值。因为机器本身也是劳动的产物，它是人们创造出来使自己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劳

动得到更好的发挥的一个手段，所以，离开了人们的劳动，它是一堆死的东西，根本谈不上由它来创造什么使用价值。归根到底，这说明：使用价值的增多，人类社会财富的增加，是由于人们的劳动，而且，是由于这一劳动凭借机器的使用而作用愈来愈大、效率愈来愈高了。再从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角度来看；同样，也不能说“劳动的作用愈来愈小了”。我们知道，抽象劳动是指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工人支出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形成价值，作为商品交换时比较的基础。至于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则由商品中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例如，一个生产者，劳动10小时，在前一个时期，他是在手工工场下进行生产的，以后则是使用机器生产了，显然，这二种情况是不同的，但只要他的劳动分别在当时都是符合于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就都能创造出10小时的价值来。当然，在这二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是不等的；但这仅影响到单位商品价值的大小。而从价值总量来看，只要包含在这些商品中的总的劳动时间不变（假定都是十小时），那么，劳动所形成的价值总量也是相同的，并不因采用机器而有所减少。此时，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在采用机器生产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同一时间内，生产了更多的商品，因而单位商品的价值减少；二、在单位商品中，活劳动部分（指新加入的劳动）的比重降低了，而构成产品的其他二个要素，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比重则相对地提高了。所有这些变化，恰恰说明了劳动的作用愈来愈大，由于使用了机器，活劳动的消耗愈益经济，其效率愈来愈高了。何况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

本身也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它們是过去的已經物化的劳动。所以，价值的源泉总是劳动。右派分子所說的“劳动作用愈来愈小了”的謬論，从抽象劳动来看，也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其次，能否根据价格与价值发生背离及其愈来愈远的趋势而胡說“劳动价值論过时了”呢？

我們知道，价值規律要求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交换。但在私有制的商品經濟中，还存在着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規律，它使得价值規律的作用只能通过市場竞争而实现。因为在生产无政府状态下，商品供求是不一致的，因而价格与价值随着求过于供，供过于求而产生背离，价值規律也就只能通过这种背离而表现其作用。例如，在简单商品生产下，或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初期，价格是环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这一情况，从个别商品的价格与价值来看，是相背离的，是不一致的；但从一个时期中整个商品来看，那末，有些商品的价格卖得高了，另一些商品則卖得低一些，因而，整个商品的总价值与总价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时，当我们說，某一商品因求过于供而价格高了，也正是以价值为基础去衡量出来的。于是，資本家的算盘一打，觉得去生产那种商品有利可图，就大量的生产它，过了一个时期，这商品的价格又因供过于求而低下来了。这样的反复，商品价格高上去后会跌下来，跌下来后又会上去，正說明了其中有个价值在制約价格，这正是价值規律的作用形式。由此可见，在私有制商品經濟中，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个别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是商品价值实现时的一种固有的現象，它是价值規律作用的表现形

式；从而，是完全符合劳动价值論和价值規律的。

右派分子楊思正据此胡說什么“商品按生产价格或壟断价格出售，是价格与价值的距离愈来愈远，从而劳动价值論过时了。”这些謬論同样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所据以利用的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現象，恰恰是私有制商品經濟中、特别是資本主义經濟中价值規律实现时所固有的現象。

上面我們已經指出了在簡單商品經濟中和資本主义初期，价格与价值已經是背离的了，这一背离表明了价值規律在私有制条件下作用的形式。同样的道理，我們認為，商品按照生产价格或壟断价格出售，也只是商品价值在資本主义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中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它不仅不与价值規律相違背，而且是以价值規律为基础的。

具体來說，关于生产价格的形成。一般是在大机器生产时期，由于各部門的資本有机构成不同，因而利潤率也有高低；产业資本家为了追求較高的利潤，就将其資本在不同部門間移出又移入，使各該部門商品的供需关系頻繁而剧烈地波动，商品价格也就随之或上或下，終于使各部門的利潤率趋于平均化，使同量資本無論投在那一部門，都能得到同量利潤，这样資本在各部門間的移轉就会相对地靜止了，而商品也不按其原来的价值出售，而按照生产費用加平均利潤而組成的生产价格出售了。这里，我們可以看到，生产价格本身就是在价值規律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其起因是資本在不同部門間的剧烈竞争和自由移注，其条件是由此而造成的商品供求关系的失調，而使价格在价值上下波动，其結果是使各部門資本

的利潤率平均化，而終于使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所以，生產價格的出現正好表明價值規律的作用，而不是價值規律的消失。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從個別商品來看，雖然其生產價格與價值是不一致的，是相背離的；但從整個社會來看，平均利潤的高低是以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剩餘價值總額的多少為轉移，整個社會的平均利潤總量和剩餘價值總額是相等的，從而商品生產價格的總和與商品價值的總和也是一致的。而且，個別商品的生產價格也會隨著商品價值的高低而起相應的變化。所以說，生產價格不過是商品價值的轉化形式，它不僅不與價值規律相違反，而且是以價值規律為基礎的。

再說，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後，由於壟斷的統治，許多商品按照壟斷價格出售了。從表面看來，壟斷價格的出現，好像是打破了價值規律的界限，價值規律不再起作用了，右派分子楊思正正是利用這一點來否定勞動價值論的。但是，事實證明，壟斷價格並沒有否定價值規律的界限。問題在於商品的壟斷價格中高出于生產價格乃至價值的部分是從哪里來的？歸納起來，它不外乎從這几方面來的：一個是，非壟斷部門資本家利潤的扣除，即壟斷部門的資本家以高價出售生產資料給非壟斷部門的資本家，這使非壟斷部門的生產費用提高了，但它並不能按照高額的壟斷價格出售其產品，這樣，非壟斷部門的一部分利潤就轉入到壟斷部門的資本家的手中去了。另一個是，工人工資的扣除，這就是將消費品按壟斷價格出售給工人，而工人工資並沒有相應的提高，這樣，就使工人的工資大大的低於其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相應的增加了資本

家的利潤。最后，这个超过生产价格甚至价值的部分，还包括了对农民一部分收入的掠夺，以及对殖民地落后国家劳动人民所創造的一部分价值的掠夺。因而，壟断价格虽是高于生产价格，甚至高于价值的价格，但其超过部分不过是壟断組織凭借其壟断地位来占有劳动人民所創造的剩余价值和价值中的一部分而已，它是在商品总价值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重分配。同时，壟断价格也仍是在价值規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不过市場价格波动的幅度更大了些，其作用的形式有所改变而已。也即在壟断时期，一方面，壟断組織通过控制产量和市場；阻止資本轉移；限制供应；壟断新技术等办法，人为地造成供少于求的情况；造成它在新技术上較长期的壟断地位。凭借这种壟断，使得它在一个稍长的时期中，能够按照高于商品的生产价格或价值的壟断价格出售其商品。但另一面，从更长一些时期中来观察，由于壟断并不能消灭竞争，而使竞争更加复杂与剧烈。因此，壟断組織并不能永久壟断新技术或是绝对的阻止資本轉移，这样，經過了一个时期以后，在新技术上的壟断地位就会消失，商品的价值会起变化，这种商品价值上的变化，使壟断价格迟早也要随之起变化的。因为当竞争由此而剧烈时，为了在竞争中击败强有力的对手，往往就会在这时把价格下降，而在某些情况下，还以低于生产价格或价值，甚至低于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其商品；等到排斥了它的竞争对手又取得了壟断地位以后，再按照高额的壟断价格出售其商品，来弥补其竞争中的损失，并取得高额的壟断利潤。所以，壟断价格的存在，并不排斥价值規律的作用，它不过是商

品价值在壟断时期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使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有所改变而已。

因而，商品按照生产价格或壟断价格出售，从个别商品来看；从一个特定时期的表面现象来看；特别是当壟断（和对于竞争而言）占优势的情况下，价格与价值的距离愈来愈远也是难免的；但从整个社会的商品的价格总量和价值总量的关系来看，价格仍是价值的表现，价值仍是价格的基础。而个别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仍然只是私有制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实现时的固有现象，它并不表明整个商品的价格总量与价值总量的距离愈来愈远了。由此可见，右派分子楊思正据此而叫嚣的“劳动价值論过时了”，只是个不經一駁的无稽之談，其目的在于进行欺騙。

既然劳动的作用也不是愈来愈小，价格与价值的距离从整个商品来看，也不是愈来愈远，商品的按照生产价格或壟断价格出售也并不違反价值规律的要求。那为什么右派分子楊思正要以此来污蔑劳动价值論过时了呢？这不能說他是出于无知，恰好是表现出其用心的恶毒。因为劳动价值論是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正是劳动价值論的确立，馬克思才进一步揭露了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之后，資本家与劳动者之間的剝削与被剝削的关系；也就是說，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过程本身就是劳动过程，也就是价值增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所創价值大于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就成为資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价值的源泉是僱佣劳动者的无偿劳动。由此，明白地暴露出資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对抗的根源来了。右

派分子楊思正倒是懂得劳动价值論在馬克思学說中的这一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因此，他抓住了这一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基石，肆意攻击，千方百計地散布其修正主义謬論。說什么現在是大机器生产的时期了，再講劳动价值論，就違反了现实和良心！？那末，这个右派分子的“良心論”，也就不言自明了，那就是：价值是机器創造的！？剩余价值也是机器生出来的！？工人貧困是活該！？跟資本家发财无关！？这二者根本没有什么不可調和的階級对抗！？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庸人自扰，毫无必要！？从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右派分子楊思正的这些修正主义謬論，是多么恶毒！多么危險！它在政治上为資本主义剝削制度辯护，麻痹劳动人民的階級意識，取消階級斗争；在理論上企图从此处打开一个缺口，以便抽掉馬列主义的基石，从根本上来全盘否定馬列主义。对此，我們要警告楊思正：馬列主义是真理，它是永远也否定不了的。

四 为资本主义世界粉飾太平——

(一) 妄图修正馬列主义关于

无产階級貧困化理論

右派分子楊思正利用党的整风机会，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力图掩盖资本主义的膿疮，瘋狂的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階級貧困化的学說，力图为资本主义制度粉飾太平，从根本上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达到取消階級斗争，維護资本主义剝削制度的目的，阴谋把我們偉大的祖国再拉回到罪惡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其实，右派分子楊思正所吹嘘的也不是什么新鮮貨色，自从19世紀末以来，资产階級的御用学者和国际修正主义者为了維護一小撮资产階級的剝削利益，曾經千方百計地誣蔑和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階級貧困化理論。特别是在战后，美帝国主义由于实行国民經济軍事化，固定資本大量更新，以及对外經济扩张等一系列的人为措施，因而，使国民經济出現了暂时“景气”的現象；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大大鼓舞了资产階級国家中工人階級的斗志，迫使壟断資本不得不作了某些社会經济上的暫时的讓步。因而使得战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工人的生活得到暫时的局部的改善，这就助长了这些国家部分工人中的改良主义幻想。资产階級的御用学者和現代国际

修正主義者也借此時機，集中火力大肆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散布改良主義的幻想，力圖麻痹工人階級的鬥爭意志，掩蓋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以達到苟延資本主義殘喘的目的。由此可見，右派分子楊思正與資產階級御用學者和現代國際修正主義者正是一脈相承，一邱之貉而已。

右派分子楊思正企圖首先否定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他說：“根據英文雜誌的統計，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並未減少而是增加，因此不能說無產階級相對地貧困化。”楊思正這套否定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的謬論，完全站不住腳。

首先，大家知道，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報刊雜誌是為壟斷資本服務的工具，是代表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它們為了欺騙本國勞動人民，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的真相，因此其所公布的統計數字往往多半是採取隱瞞或縮小的手法來欺騙群眾。就以美國“商業現況”雜誌每年公布的“職工報酬”統計數字來說，經常是把許多工人貴族、高薪俸的人員（如經理等）的收入都被算作一般職工的收入。這樣一來豈不是就大大地夸大和歪曲了勞動人民的收入，而縮小了資產階級的剝削所得嗎？必須指出，美國許多報刊雜誌的報道是經常用少數享有特權的工人貴族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來裝璜門面，吹噓工人階級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生活如何如何“富裕”、“幸福”。美國報刊雜誌之所以大肆宣揚、大吹大擂，其目的無非是想美化千瘡百孔的資本主義腐朽制度，腐蝕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

企图取消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争取人心……而已。难道楊思正不了解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嗎？不是的，他們是故意閉着眼睛不看事实罢了。

其次，战后美国壟断資本所获得的利潤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增长了，还是美国工人阶级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增长了？事实証明，美国壟断資本的利潤已从战前1938年的33亿美元激增到1955年的427亿美元，增长达13倍。而战后美国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却从战前1923年的54%下降到1951年的42%。根据1957年美国“幸福”杂志发表的一篇調查美国豪富的文章，它也不得不承認：“在美国占总戶数93%的家庭只分配到全国国民收入的35%，其余65%是被占总戶数7%的豪富之家占有”这一事实（見1958年1月2日上海“新民晚报”）。作为社会財富創造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他們的人数最多，但所得的份額最少，而且还不断下降，从54%下降到42%，最后下降到1957年的35%，这就是美国的所謂“富裕”“幸福”的真象。93%的家庭只占有1/3的国民收入，由此不难想象美国广大劳动群众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地位了。这篇調查报道不仅是埋葬右派分子楊思正否定无产阶级相对貧困化謬論的最有力的証据，也是給予那些頌揚美国“幸福”“富裕”的其他右派分子們当头一棒！事实充分証明，楊思正的这一謬論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已被鉄的事实所粉碎，而彻底破产了。

右派分子楊思正不仅否定无产阶级相对貧困化，而且他更坚决否認无产阶级绝对貧困化。他說：“战后工人阶级的实

际工資和就业人数在增加，生活水平并未降低，因此也不能說无产階級絕對貧困化。”他的这一謬論也同样完全站不住脚。

首先要問楊思正：战后美国工人階級的实际工資是否在不断增加？即使用美国資產階級报刊杂志的資料亦完全帮助不了楊思正。就拿“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杂志的統計資料來說：“1950年—1954年在美国許多重要部門中，鐵路工人的实际工資下降1.6%，汽車制造工人下降2%，紡織工人下降6.3%，矿工下降15.3%，零售商业店員下降3.6%，农业工人下降10.3%”（見国际譯丛1956年2期“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而在危机之中，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更大大的下降了，拿最近1958年3月12日美国劳工統計局所公布的材料来看：“1958年2月美国的生活費用指数是122.5（以1947—1949年的平均数为100），1958年比1957年生活費用指数上漲了3.2%；工人的实际工資比一年前下降約5%”。这一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毋庸置疑是大大縮小了，但是不論怎样，生活費用上漲和实际工資下降却是美国政府公开承認而无法諱言的事实。除此而外，美国的捐稅亦剋扣了工人全部收入的1/3以上：1956年美国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的稅收共計約1,000亿美元，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数字，每人平均負擔608美元，比20年前增加了7倍（1957年“世界知識手冊”第755頁）。再加上社会保險，养老保險等，工人們的收入就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生活費用上漲，实际工資下降，捐稅負擔加重……这都是美国工人階級生活状况不断恶化的証据，这是右派分子楊思正無論怎样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再看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的就业人数是否在不断增加？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失业人数统计：(每年2月份)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945	640,000	1952	2,358,000
1946	2,650,000	1953	1,986,000
1947	2,604,000	1954	3,994,000
1948	2,851,000	1955	3,583,000
1949	3,489,000	1956	3,136,000
1950	4,828,000	1957	3,121,000
1951	2,572,000	1958	5,250,000

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其可靠性是大成问题的，这些数字甚至连美国若干议员亦加以否认。根据美国参议员道格拉斯在今年3月12日所说：“美国今年全失业的人数，2月份已达640万人，与美国官方的数字竟相差100余万人之巨！这是因为美国政府把下列的失业者均不计算在内：(1)未曾登记的失业者；(2)未经批准领受救济金者及逾期注销领受救济金者；(3)保持职位名称而无实际工作者；(4)非自立的劳动者(即年在14岁以下的童工)；(5)农村中潜在的失业者等等。由此可见美国官方所公布的失业人数统计(尚不包括半失业人数在内)，其可靠程度是可想而知了，而右派分子竟据此来攻击马列主义，显然是别有用心！

即使根据上述的数字，我们亦同样可以用它来驳斥杨思正的谬论。例如美国失业人数从1950年2月的480余万人下降至1951年2月的250余万人，这不是侵朝战争给美国就业状况带来暂时的好转吗？如果杨思正想故意回避是战争、经

济軍事化、消費、信貸……等人为因素維持了美国的暂时“景气”；那末他又怎样回答自朝鮮停战后美国的失业人数从1953年2月的198万人又重新上升到1954年2月約460万人，以及从1957年2月失业人数312万猛增至1958年2月的520万人这一鉄的事实？其次，美国战后的全失业人数經常保持300万左右这一很高的水平，最近全失业人数又扩大到500万以上，再加上300万半失业者（实际上半失业有900万人），若以一家四口計算，那就是說約有3,200万人（占美国人口总数1/6）的美国居民已陷入无以为生的悲惨境地。这难道就是右派分子楊思正所頌揚的美国“战后工人就业人数在增加”嗎？經常的大批失业和半失业人数不断增长，难道不正是无产階級絕對貧困化的表現嗎？

再說，战后美国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真是“并未降低”嗎？右派分子楊思正、王士章及其他許多右派分子們总是口口声声說战后美国工人階級的生活是如何“富裕”“美好”，他們有住宅、有汽車、有冰箱、有电视机……因此他們認為馬克思的无产階級貧困化理論“不适用于美国”！“馬列主义理論已經过时了……现在还講五十年前的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是違背现实和良心”！这是对馬克思主义最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必須指出：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价值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变化的。从表面上看来，战后美国工人的生活比起前一世紀有了显著的不同。但这只能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工人的生活的方式、生活标准有了变化，不能說是工人的生活变得

“富裕”了。并且馬克思的无产階級貧困化理論亦并不排除在資本主义經濟发展的条件下，工人階級的工資和生活有局部的暂时改善的可能。馬克思曾經着重指出：“……在工人們自己的繼續膨大并不断轉化为追加資本的剩餘生产物中，将会有較大一部分，在支付手段的形式上，流回到他們自己手中，讓他們去扩大享受的范围，使他們能够更充裕地有家具等等消費基金，并积貯少許的貨幣准备基金。可是，衣食及待遇的改善及私人用物的增加，不会廢絕奴隶的从属关系与剝削，也不会廢止工資劳动者的从属关系与剝削。劳动价格随資本积累而提高的現象，实际不过表示劳动者为自己鍛造的金鍊，已經有这样长这样重，略微放松一点也无妨而已。”（註：重点系本书作者所加，見“資本論”第1卷第777頁）。虽然战后美国有部分工人的工資收入得到某些暂时的提高，但与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比，工資水平还是大大低于其劳动力的价值。最近新华社报道美国劳联——产联的秘书威廉·希尼茲勒描述战后美国工人生活时说：“有3,000万个美国家庭全年收入不到2,000元（按：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作出的海勒氏預算，一个四口之家的美国工人家庭每年最低生活費用是5,465美元；上述收入尚不到这一最低标准的40%）……他們中有許多人在挨餓。”美国官方亦公开承認这一事实的存在，根据美国官方統計，“5,000万工人中达到海勒氏預算的人数只有3/5，在400万农业工人中达到海勒氏預算的人数只有1/3”（“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国际問題譯丛1966年第4期）。更何况美国工人階級和劳动群众由于賒購房屋、汽車和耐用消費

品到1957年12月31日止，已欠下消費信貸達510億美元，過着靠背債渡日的困窮生活。因此，這怎能說戰後美國工人階級的生活變得“富裕”呢？何況，生活狀況這種可憐的改善，還是戰後美國工人階級經過艱巨的鬥爭所得來的，目前美國的經濟危機又成為美國壟斷資本重新向工人階級組織進攻的大好時機。今年3月在美國克里夫蘭工廠主的會議上，資產階級的著名經濟學者斯里契特就在會上公開叫嚷：“目前的經濟衰退（按：其實這是經濟危機）給予工廠主以修改勞動政策的絕好機會。”在資產階級眼光里看來，如果這次經濟危機不能促使工資進一步降低，那末這次危機就純粹是“蝕本生意”。事實亦完全證明這一點，1957年11月美國製造業工人的貨幣工資已開始比1956年11月下降了5.2%，最近美國底特律城的工人工資亦已下降了2.5%……這些事實不是清楚地證明了無產階級無法擺脫“工資勞動者的從屬關係與剝削”，無法擺脫貧困化的根本趨勢嗎？

現在，工人們已經到達只有節省生活消費上的開支，才能繳納捐稅和房租，償付除購物品的債款的地步。據美國農業部1953年的報告：“美國平均每人每年的肉類、面粉、乳類的消費量在日趨下降”。美國農業部科學處處長弗雷德·貝萊也公開地說：“以居民每人計算，美國的肉類消費僅占世界的第6位，而牛奶的消費占世界的第13位”。（見國際問題譯叢，1955年第12期“關於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貧困化的新資料”）。在居住條件方面，根據美國“家庭服務社”的調查，僅紐約這一最繁華的城市就有26萬個家庭沒有住宅，有50萬個家庭尚

住在貧民窟中。美国其它的城市更可想而知了。

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美国的工人为了想多挣得一些微薄的工資，不願健康地拼命延长工作時間并提高劳动强度。再加上資本家采用“赶快制度”加紧对工人的剝削，这就使美国的工人工作了8—10年就丧失劳动力；往往許多工厂的工人到35岁或40岁即不能繼續工作。这一点連美国总统艾逊豪威尔也无法否認，他在1955年9月5日劳工节的演說中不得不說：“我們不要規避所面临的越来越重要的問題……很多劳动者不能找到有报酬的工作，只是因为他們已經超过45岁了……。”在美国常常可以看到工人在招工处报名以前，男的把鬚发染黑，女的涂脂擦粉。有的人每月花費六美元購買藥品用来在劳动时活跃心脏。由于工作过渡緊張和缺乏劳动安全設備这就使工人伤亡事故激增。据美国官方統計：1949年工人伤亡事故是187万件，1951年是212万件，1956年是435万件。……以上所有这些事实都是战后美国工人階級与广大劳动人民絕對貧困化最有力的証据。由此可見右派分子楊思正否認战后无产階級絕對貧困化的謬論是彻头彻尾的謊言。

最后，我們要了解无产階級貧困化，不仅要研究在业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而且亦要考察失业工人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資本主义国家的在业工人已是如此遭遇，那失业工人的痛苦情景更可想見。最近美国各个城市出現了一种使人恐惧的“繁荣”，那就是在各个城市的街道上都出現了四路縱队，八人一排的失业登記队伍，領取失业救济金的队伍，領取慈善食堂的面包和菜湯的队伍。这不仅給美国的城市带来凄凉和惶

恐，亦給那些宣揚美國工人生活“幸福”的楊思正、王士章及其他右派分子們当头一棒！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的統計：“在500多萬失業工人中，現在只有3,274,000人能夠領到失業救濟金，其餘200多萬失業工人的生活就毫無着落”。失業救濟金的期限一般只有3個星期至6個星期，最長亦只有幾個月，並且失業救濟的金額據美國許多報刊的計算，亦“抵不上一個美國普通家庭費用的四分之一”，領完了就再也得不到其他任何收入。目前美國紐約、賓夕法尼亞、加利福尼亞……平均約有30萬人領失業救濟金；底特律、俄亥俄、伊利諾斯、新澤西、馬薩諸塞等州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數亦都在一、二十萬人以上。領不到失業救濟金者就只有向慈善食堂去乞食來勉強維持辛酸的日子。一位威斯康星州的工會發言人說：“我們這個州，至少有10萬人在挨餓！”在芝加哥一個失業的老工人痛苦地說：“我實在餓得要命，我並不羞於承認這一點……我昨天晚上付了7毛錢的住宿費，現在口袋里只剩下2分錢了。”還有一位年老的工人發出了更淒慘的呼聲，他寫信給美國勞工部說：“政府能不能把象我這樣年齡的人都槍斃了呢？這樣做比強使我挨餓還要人道一些。”美國紐約郵報不久前刊載了一篇慘痛的消息：“一個名叫雷蒙、羅德里格斯的失業工人由於失業二個月，又找不到工作，但他明天又必須按期繳付每周15元的房租，因此他在今年3月17日晚上在家上吊自殺了。在他自殺後，警察從他口袋里只摸出6分錢。”……夠了，這些悲慘的活生生的事實竟會出現在20世紀的“金元”美國，這是對楊思正及其他右派分子們的一個無情而嚴酷

的打击。

显然，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尚且如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更不难想象是处在怎样一种悲惨的境地了。目前美国的经济危机正在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给予工人阶级以沉重负担和巨大灾难，因此，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不是削弱而是进一步加强了。这一事实证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的一切经济斗争所能取得的，都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不稳固的胜利；并且随时随刻都会丧失和破灭。无产阶级要根本摆脱贫困；求得自身真正的解放，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否则，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总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事实胜于雄辩，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在今天没有过时，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这一理论就永远不会过时。右派分子说什么“现在还讲五十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违背了现实和良心”，恰恰相反，倒是今天美国这一寄生、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违背现实和良心的！倒是王士章、杨思正如此为这种制度无耻辩护是根本违背现实和良心的！！

五 为资本主义世界粉飾太平——

(二) 妄图修正馬列主义关于

經濟危机理論

右派分子楊思正一貫坚持反动立場，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經濟理論进行种种恶毒的进攻。他否定劳动价值論，修正无产階級貧困化理論，进而又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經濟危机的理論，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馬列主义，在思想上解除无产階級的武装，为資产階級复辟舖平道路。事实証明：右派分子楊思正是壟断資本主义的盲目崇拜者，是彻头彻尾的凱恩斯主义反动学說的义务代言人。

右派分子楊思正說：“馬克思的經濟危机理論是从經濟因素来分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考虑政治因素，即上层建筑对經濟基础的反作用，所以資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也就发生了变化。”他的論据是：战后国家政权的作用扩大了，国家控制了經濟，它可以通过国民經济軍事化和扩軍备战来避免危机。按照楊思正的說法，似乎：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資产階級国家已經控制了經濟，而国家控制經濟的主要内容是国民經济軍事化和扩軍备战，这是楊思正右派謬論的重要前提；2. 从而，資产階級国家就能够通过国民經济軍事化和扩軍备战来“調节”資本主义經濟以避免經濟危机。因

此，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危機不可避免的理論似乎已不適用於戰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帝國主義。

現在讓事實來回答右派分子的謊言。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產階級國家 控制了經濟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產階級國家真的是通過國民經濟軍事化和擴軍備戰政策掌握了經濟嗎？所謂“國家控制了經濟”的實質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與右派分子楊思正存在着根本分歧。我們說：戰後，不是資產階級國家控制了經濟，而是壟斷組織對國家的控制加強了，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強化，是資產階級國家執行壟斷巨頭的意志，通過擴軍備戰和國民經濟軍事化使自己進一步為壟斷組織的壟斷高額利潤服務。大家知道，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時期的產物，是帝國主義時期一切矛盾尖銳化的必然結果。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實質在於：壟斷組織使資產階級國家從屬於自己，使它成為壟斷組織追求壟斷高額利潤的御用工具。壟斷組織派遣自己的代理人或者是親身參與對國家的領導，從而使資產階級國家成為壟斷資產階級意志的忠實執行者。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資產階級國家是怎樣的通過國民經濟軍事化和擴軍備戰來為壟斷組織服務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壟斷資本通過國家機構及其

代理人獲得了巨額的軍事訂貨，並且按照壟斷資本的意志取得了原料和裝備的優先供應，而所生產的軍需品卻又按照高昂的壟斷價格賣給國家，從而，使壟斷資本取得了驚人的壟斷高額利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1940年6月到1944年9月美國的100家大公司就取得了總數1,750億美元軍事訂貨的67%，而其中的33家就取得了軍事訂貨總額的51%。^①這100家大公司並且優先取得了戰略物資和原料的大部分。在侵朝戰爭期間也是一樣，從1950年6月到1953年6月的三年中，這100家大公司獲得了軍事訂貨總額9,872,300萬美元的64%。^②與此同時，壟斷資本所獲得的利潤也有驚人的增長，上述100家大公司1942年納稅前的利潤較之1936—1939年的平均利潤增長數倍乃至數十倍以上，其中：48家公司增加為3倍以上，34家公司增加為10倍以上，5家公司增加為100倍以上。^③侵朝戰爭發生後，僅以美國的五家大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杜邦公司，美國鋼鐵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通用電氣公司）而言，納稅後的利潤就由1949年的1,434.8百萬美元激增到1950年的1,942.9百萬美元，即增加了35.41%。^④

至於談到最近的例子，也可以看到美國的導彈生產養肥了軍火商人。根據美國“民族”周刊的報導，美國目前從事導

① 見庫茲明諾夫：“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165頁。

② 同上書，第203頁。

③ 見同上書，第163頁。

④ 見同上書，第204頁的數字計算出來的。

彈和火箭生产的大公司主要有 13 家，这 13 家大公司分别掌握在洛克菲勒、摩根等壟断巨头手中，其中的 6 家是百分之百的为軍事訂貨而生产，其余的 7 家也有 60—95% 的生产是軍事訂貨。在 1956 年这 13 家公司納稅后的利潤为 156 百万美元，比 1951 年侵朝战争时期增加 4 倍。这些大公司与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有着密切的“私人联合”，美国現任的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原来是摩根集团所控制的通用电气公司和克萊斯勒公司的董事，因此他上任之初立即就把制造“丘辟特”式中程導彈的訂貨交給克萊斯勒公司，而現任国防部副部长卡利斯以前就是这 13 家大公司之一的貝尔电话公司的研究所所长。^① 再看看現在新当选的紐約州州长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过去就曾先后担任美国政府的副部长和总统特別助理等职位，1956 年 1 月，在他写給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秘密信中，更全面地指导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为以后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画出了初步的藍图。最近由于他花费了 200 万元美金的“竞选費”，爬上了紐約州州长的宝座，为 1960 年进入白宮准备了条件。以上一系列的数字和材料証明，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原来是亦官亦商，二位一体，而美国的政府机构与壟断財团原来是血肉相連，休戚与共。这就是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实质所在。如果用右派分子楊思正的話來說，也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国家掌握了經濟的实质所在。壟断巨头及其代理人之掌握国家机构；战争和国民經济軍事化养肥了軍火商人；而通过国家对經濟

① 見 1958 年 1 月 31 日“人民日报”报道。

的“干預”，把大量的軍事訂貨优先給予壟斷巨頭，恰恰有力地証明了資產階級國家是全心全意的為壟斷組織服務的，而並不是什麼“超階級”的機構。更其有趣的是美國“民主文摘”今年2月號所刊載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指出：美國政府對1959財政年度預算案中的衛生、福利、教育、土壤保護、城市修建等關係人民生活福利問題的處理，原來是根據1957年9月美國壟斷巨頭的組織“全國製造商協會”出版的名為“控制和削減1959年聯邦預算的指南”的刊物所指示的原則進行的。這些原則就是：1. 一筆勾銷；2. 大大削減；3. 轉嫁責任於各州。文章所揭露的事實證明：艾森豪威爾也的確忠实地執行了這些指示。^① 這一事實有力的揭露了美國政府的階級本質，是國家“干預”經濟呢？還是壟斷資本掌握着資產階級的國家并使它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右派分子楊思正表面上似乎也承認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關係的基本原理，但是在實際中，他却又把它推翻了：他認為戰後資產階級政權的作用擴大了，似乎國家掌握了經濟，通過國民經濟軍事化和擴軍備戰就有可能來“調節”經濟，消滅經濟危機！而眾所周知，經濟危機的根源恰恰在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因此，右派分子楊思正實質上是在美化資產階級國家，力圖掩蓋它的階級本質，把它打扮成“超階級”的機構，似乎國家駕凌於階級之上，並有可能來削弱壟斷資本主義和抑制壟斷資本的巨額利潤，他的同路人右派

^① 見1958年3月31日“人民日報”報道。

分子王士章也曾竭力吹嘘所謂“羅斯福的新政”，一唱一和，說明這兩個右派分子完全是“一邱之貉”。然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历史發展過程中，一系列的事實證明了：資產階級國家不管它以什麼形式出現，在美國不問它是由共和黨還是由民主黨來執政，不論是羅斯福還是艾森豪威爾，不問它的作用擴大到什麼程度，歸根結蒂它的階級本質仍然沒有發生絲毫的變化，它的背後仍然站着華爾街大老板，它不敢而且也沒有可能真正去觸犯壟斷資本的利益。在帝國主義時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強化，資產階級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不是證明資產階級國家“超階級”的性質，更不是說明了資產階級國家掌握了經濟，而恰恰證明了國家機構從屬於壟斷組織，是壟斷財團的御用工具；證明了適應於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只有反過來加強壟斷資本的統治，並且忠誠地為它服務的作用，而不可能再有什麼其它“擴大了”的作用。

〔二〕 擴軍備戰可以避免經濟危機嗎？

右派分子楊思正熱烈的頌揚美帝國主義的擴軍備戰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政策到如此程度，似乎由於美帝國主義執行了擴軍備戰的政策就有可能避免經濟危機。這一方面說明了右派分子楊思正是如此的喪心病狂，千方百計的為帝國主義戰爭政策辯護，並且為它找尋理論根據；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是如此的無知，竟然認為人為的因素可以改變客觀經濟的進程，消滅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經濟規律的作用。和一切的反動

派一样，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論者。

如所周知，資本主义生产过剩經濟危机的根源在于資本主义制度的本身。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私人資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是經濟危机的基础，只有消灭資本主义，才能消灭經濟危机，这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早已为資本主义发展过程所証实。右派分子楊思正却别有用心，企图从根本上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經濟危机的基本理論。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主張理論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認為必須随着客观經濟条件的变化来总结新的經驗，丰富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宝庫。因此，馬克思列宁主义承認随着战后客观經濟条件的变化資本主义經濟危机周期产生了一些新的历史特点；但是，这与右派分子楊思正的謬論毫无共同之处。馬克思列宁主义表明：不論危机的形式如何变化，只要資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它的本質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扩軍备战和国民經济軍事化对資本主义生产起了重大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經濟的暂时“繁荣”和“緩和”了經濟危机的发展，但是它絲毫也不能改变資本主义經濟发展的总进程，也不可能动摇資本主义的經濟基础；相反的，它却孕育着更加深刻的矛盾，使經濟危机在更深刻的基础上爆发出来，这一点也已为資本主义当前的现实所証明。

首先，扩軍备战和国民經济軍事化强化了資本的积聚和集中，加深了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前所述，資产階級国家把大部分的軍事訂貨优先給予那些与美国政府具有密切联系

的大壟斷組織，而為數眾多的規模較小的企業，却只分得了微不足道的軍事訂貨。根據前述資料，從1940年6月到1944年9月，美國有13,191家公司只分得了總數1,750億美元軍事訂貨的2%；^① 不僅如此，巨大的壟斷組織在戰時還經營國家建立的軍需品工廠的75%，^② 在戰後，國家又按照低價把這些企業賣給壟斷組織，與此同時，國家還實行了對壟斷資本減稅和低利貸款等政策；這樣不僅加強了大壟斷組織的競爭力量及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而且也使中小企業對大企業的依賴進一步加強了。中小企業不得不依賴從大企業手中轉包到一小部分軍事訂貨，從而使自己在生產上失去獨立性，或竟為大企業所吞併。資本積聚和集中的速度由於美國政府執行國民經濟軍事化和各種有利於壟斷資本的政策而大大地加速了。根據統計資料美國在戰時和戰後，大魚吃小魚的情況大大的增加了，擁有千萬美元以上資本的最大的公司所吞併的公司在1940—1947年占公司總數的57%，在1948—1954年占65%，在1955年和1956年分別占67%和66%，^③ 至於破產的公司，在1956年登記數為12,686家，^④ 為1940年以來企業倒閉最多的一年，而“幸福”雜誌所公布的關於美國包括采礦和製造工業在內的500個大公司的材料，更典型地說明了美國資本積聚和集中達到了如此驚人的程度！

① 庫茲明諾夫：“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165頁。

② 同上書，第166頁。

③ 見1957年“美國統計概要”。

④ 見“世界經濟文匯”，1957年第5期。

	1955年	1956年	500个大公司所占%	
			1955年	1956年
公司数	500	500	0.4	0.4
雇工人数(单位:千人)	8,604.5	8,793.3	50.0	—
售貨流通額(单位:10亿美元)	161.4	174.3	54.0	53.0
资产总数(单位:10亿美元)	122.3	139.0	59.0	—
納稅后利潤(单位:10亿美元)	11.2	11.5	68%	65%

以上的材料說明了由于美国政府实行了軍事訂貨的分配制度,減稅及低利貸款等政策,这就大大加强了壟断資本的力量,从而加速了資本积聚与集中,大大加强了生产的社会性,使絕大部分的生产資料和劳动力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壟断巨头手中。由此可見,不是如右派分子楊思正所控造的那樣說法,扩軍备战可以避免經濟危机;而是恰恰相反,它大大加强了資本主义經濟危机所借以产生的基础——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其次,美国的扩軍备战政策对美国經濟暂时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这是因为軍火生产增加了对第一部类产品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就业人数的增加和軍事人員的扩充,增加了对軍需消費品的需要,这也带动了第二部类生产的发展。战后13年以来,美国直接軍費开支共达3,986亿美元,現在美国每年的国防費用占国民收入的14%以上。① 問題还不在于这样一笔龐大的开支既不用于生产消費,也不用于个人消費,对社会來說是一种純粹的虛費;而是在于扩軍备战的結果,必然使国民

① 見“紅旗”杂志,第1期第21頁。

經濟片面發展，使生產力發展畸形化。這是因為軍事生產是依靠犧牲民用生產發展起來的，其結果使第一部類生產特別是重工業生產片面擴張，而第二部類生產亦有所增長，却呈現萎縮狀態，這就必然要引起軍事生產和民用生產、第一部類生產和第二部類生產之間的矛盾，從而加劇了生產無政府狀態和再生產過程的不平衡發展。在這次危機中，美國工業生產在今年頭四個月中就下降了14%，^①而其中尤以重工業下降最為厲害，到今年4月與一年前比較，鋼鐵減產45%，煤24%，石油16%；汽車40%，機器設備20%。^②作為美國工業的兩大支柱的鋼鐵和汽車工業情況尤其嚴重。在本年4月初，鋼鐵開工率只有48%，今年頭九個月的鋼產量已從去年同期的8,770萬噸下降到5,907萬噸，一般估計，今年鋼產量只有8,000萬噸左右，全年平均開工率預計只達60%，^③汽車工業開工率在今年四月初也不到65%，^④汽車存貨在4月份達到85萬輛，超過正常存貨數量25—35萬輛，估計今年產量不會超過450萬輛，比產量最高的1955年下降38%，^⑤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由此可見，擴軍備戰不是可以避免危機，而恰恰是加劇了資本主義再生產的不平衡發展，在表面繁榮的帷幕後面，孕育着更加深刻和廣泛的經濟危機。

① 見1958年5月14日“人民日報”。

② 見“財經研究”，1958年第4期第34頁。

③ 見1958年11月28日“人民日報”。

④ 同②。

⑤ 同③。

第三，資產階級國家是軍備市場的唯一消費者和購買者。軍費開支的膨脹增加了預算的赤字。美國從1952—1955年的四年中，預算赤字計達208億美元；^①因此，擴軍備戰的結果不可避免地造成軍事通貨膨脹。國家通過稅收、公債等等形式把巨大的軍費負擔轉嫁到廣大勞動者身上。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在1957年美國工人平均工資收入只有4,284美元，而按照“海勒爾委員會”的計算，一個靠工資收入維持的家庭生活費用每年至少需要5,830美元。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的材料，從1957年1月到1958年1月的一年中，總的生活費用上漲了3.5%。^②與此同時，勞動人民的捐稅負擔也隨之加重了，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在1956財政年度中，每一個美國人（包括成人和兒童）平均的捐稅負擔是608美元，1957年度為640美元，1958年度更將上升到658美元。^③對作為社會基本消費者的勞動人民的殘酷壓榨，不能不使社會有支付能力的需要遠遠落后於即使已處在萎縮狀態的生活資料的生產，這就不能不使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尖銳化。

〔三〕 人為的措施醫治不了資本主義先天的痼疾

資本主義的現實拆穿了右派分子的謊言。右派分子楊思正所謂的“擴軍備戰和國民經濟軍事化可以使資本主義避免

① 見“世界經濟文匯”，1957年5月號。

②③ 分別見1958年6月27日和3月20日“人民日報”。

危机”的謬論在事实面前已經彻底的破产了。現在美国已日益陷入严重的經濟危机，而且危机正日益深刻而广泛的冲击着整个資本主义世界。資本主义制度由于其固有的矛盾不仅不能預防和避免經濟危机，并且在日益发展的經濟危机面前也显得手忙脚乱，无能为力。

1956年3月，在半个月的時間內美国政府連續提出了所謂“第一号”和“第二号”的“反衰退計劃”。在这些所謂“反衰退計劃”中，采取撥款18.5亿多美元来兴建住宅和撥款55亿美元来建筑公路，另外还要动用5—6亿美元的政府基金延长失业工人領取救济金的期限；以后又提出要增加14.55亿美元的軍事撥款。^①在此以前，从去年11月起就已采取了放寬銀根，降低利率的方法以鼓励投資，刺激經濟活动。美国的产联—劳联更对政府提出減稅60—80亿美元的要求。^②所有这一切措施，就是美国政府已經采取或打算采取用来应付危机的灵丹妙方；然而，这却不能挽救資本主义的危机，反而使美国政府日益陷入矛盾重重狼狽不堪的境地。撥款兴建公共工程，正合上了中国一句老話，叫做“远水救不了近火”；因为实现公共工程計劃，必須經過一系列勘测設計和施工的准备工作的，連艾森豪威尔也不能不承認这不能解决目前的严重問題。延长失业工人領取救济金的期限，除了企图欺騙工人以外，对美国經濟活动根本起不了什么刺激作用，因为有幸領取到救济金的那一部分工人頂多也只能維持半飢半飽的生活，根本談不到

①② 見1958年4月5日“人民日報”。

拿它来購買工业品,显然这是不可能提高工人的購買力的;何况区区5—6亿美元对1,800万失业和半失业工人來說,何异杯水車薪,无济于事!至于說到右派分子楊思正所吹嘘的軍事撥款也不是什么起死回生的万应灵丹。这是因为美国政府所增加的軍事撥款主要用于導彈生产,而導彈生产是不需要大規模的技术和大批工人就业的。除此而外,放寬信貸也沒有产生什么效果,美国从去年11月起連續降低貼現率三次,由3.5%降低到2.25%,但从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3月15日止,銀行放款总額反而比一年前减少了20多亿美元,①这就証明了在严重的危机中,資本家对向銀行貸款来新建或扩建企业的胃口不大。必須指出:所有这一切措施却是要依靠国庫来加以弥补的,其結果是挖肉补疮,寅吃卯粮,政府的开支增加了,預算赤字就扩大,原来估計1958財政年度(到本年6月底止)的赤字只有4亿元,現在已經激增到28亿美元,②1959財政年度将增加到122亿美元。③赤字的增长意味着捐稅增加和物价上漲,意味着广大劳动人民的貧困化,更为加剧。資产階級还企图利用危机发动对工人階級生活水平和工会权利的猖狂进攻。美国“幸福”杂志露骨的表达了这种疯狂的心情,它写道:“当商人們說經濟衰退是一种健康現象的时候,他們多半是指衰退可以制止工資的不断上升。”美国著名資产階級經濟学家斯里契特更公开的指使資产階級向工人階級工会权利进攻。

① 見“財經研究”,1958年第4期。

②③ 分別見1958年7月23日和11月17日“人民日報”。

他說：“目前的經濟衰退給予工厂主……以修改劳动政策的絕好机会。”^① 在經濟危机，失业和飢餓的威胁下，美国广大工人举行了反失业示威。工人們責問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說現在應該买东西，告訴我們用什么来买?!” “飢餓並沒有緩和下来，我們不能靠(政府的)諾言充飢!”^② 很显然，随着美国經濟危机的发展，階級矛盾將日益尖銳化起来。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見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系列人为措施，虽然也可以对經濟危机的发展产生某些暫時的影响；然而，它却不可能挽救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发展；这充分証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資本主义經濟危机不可避免的理論是顛扑不破的真理。資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不仅嘲笑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也嘲笑了坚持資產階級反动立場、极力美化資本主义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 * *

右派分子楊思正和王士章一味的为資本主义制度涂脂抹粉，粉飾太平，硬是把資產階級国家的階級本質掩盖起来，力图閹割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經濟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似乎資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經濟危机与資本主义制度毫无联系，帝国主义国家所执行的扩軍备战和国民經济軍事化的政策却有可能在保留生产資料資本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来消灭經濟危机，其罪恶之用心在于为帝国主义的扩軍备战政策辯护，竭力美化資本主义使資本主义制度永垂不朽。必須

①② 分別見1968年3月31日和5月3日“人民日報”。

警告右派分子，你們可以醒醒了，当前的形势是东风已經压倒西风，并且繼續压倒西风，中国、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大跃进与帝国主义国家生产的大衰退，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重要标志之一。美帝国主义所玩弄的“扩軍备战”和“战争边缘”政策正在日益遭到本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几个月前美英帝国主义为了破坏伊拉克人民的革命，公然出兵侵占了黎巴嫩和約旦，以后，又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妄图实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帝国主义所进行的这些疯狂的頑火行为，在社会主义陣营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压力下业已宣告破产。最近美英帝国主义不得不夹起尾巴滚出了黎巴嫩和約旦。美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进行战争挑衅的罪恶行为，已經激起了我国6亿人民的愤怒抗議，受到社会主义陣营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美蔣之間的矛盾也日趋尖銳化了。事实証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紙老虎，它做尽坏事，必然要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群起而攻之，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这就是历史发展为帝国主义所下的結論。包括我国右派分子在内的一切反动派妄图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是心劳日拙、枉費心机的。

六 对“农业合作化太快了”謬論的批判

右派分子楊思正仇恨党，反对党所领导的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当然他对党所組織和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必然是刻骨仇恨、濫施攻击的。他說什么，“合作化太快了，不巩固”，其所謂“依据”就是“苏联农业集体化也太快，犯了錯誤”，他还說我們的增产数字是夸大的。从表面上看来，好象他只提到了合作化的方法問題，似乎他也并不反对合作化，还“关心”着合作社的巩固呢！其实不难識破这又是楊思正的阴谋鬼計。因为合作化运动进行得快些好些和慢些差些不仅是两种方法的斗争，而且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是說讓 5 亿多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讓汪洋大海的小农經濟泛濫成灾？何况农业合作化进行得快些好些和慢些差些的斗争已經在理論上、实践上都胜利地解决了，大家知道，1955年7月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著作，已經在理論上解决了这个問題，1955年秋冬和1956年春季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經在实践上解决了这个問題。那末右派分子楊思正为什么还要发出“合作化太快了，不巩固”的謬論呢？显然他指的不是方法問題，更不是关心合作社的巩固，而是企图抹煞合作化的成績，妄想要农民回到单干的老路上去，企图挑撥党和群众的关系，挑撥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妄想达到資本主义复辟

的陰謀。

右派分子楊思正污蔑合作化太快、不巩固的所謂“依据”是“苏联农业集体化也太快，犯了錯誤”，这里他又玩弄了混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夸大个别缺点抹煞成績的毒辣手法。我們知道苏联是第一个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列宁同志在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創造性地制訂了合作社計劃，这一計劃就是以巩固工农联盟建成社会主义为指針的，因此非常強調农民自愿的原則，苏联共产党在整个集体化过程中都重視貫徹了这一原則，所以1929—1930年間开展的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正是党和政府正确执行集体化政策的胜利，虽然当时有某些地区違背了自愿原則发生冒进的現象，但是整个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对于第一个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这样偉大的史无前例的群众性革命事业來說，产生个别的缺点是难免的，何况某些地区冒进的現象，很快就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糾正了。为什么右派分子楊思正要抓住这种个别的暫时的缺点，污蔑为整个集体化运动的錯誤呢？这不是否定苏联共产党領導的正确性又是什么？不是妄图根本取消农业集体化又是什么？

右派分子楊思正不仅企图否定苏联共产党領導的正确性，更主要的是企图否定我們党的領導的正确性，否定我們的合作化成績。他所謂苏联农业集体化太快、犯了錯誤，显然是污蔑苏联共产党犯了强迫命令的錯誤，并且企图借此証明在我們合作化过程中也犯了同样的錯誤，言下之意就是我国1955年展开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不是客观条件已經成熟的結

果，不是农民的自觉运动，而是领导上强迫命令搞起来的。但是事实怎么样呢？1955年下半年，自从各地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农民是那样的热情与兴奋，争先恐后的申请入社，有些地方在一两天内甚至几小时内就突破了合作社的计划发展户数，从1955年7月到1955年12月，几个月的时间就有5,000几百万农户，即占全国50%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党中央原来估计在1958年完成合作化，实际结果是1956年冬季就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高潮为什么能够这样迅速的到来呢？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正是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表现，首先是因为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不仅胜利地领导了人民民主革命，在人民群众中有深远的崇高的威信；党又正确地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创造性的制定了适合我国具体特点的政策，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并有长期领导合作化的成功经验。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解放区农村开始组织互助组；全国解放后，先后大发展好几批合作社，结果也都巩固了、增产了。这些合作社在广大农村中树立了旗帜，提供了丰富的办社经验。其次，因为我国原来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解放以前，农民受尽剥削，在贫困中生活了几千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所以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很高。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

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①无数生动的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真理，如在合作化高潮以前，某些地区由于领导上的右倾保守思想，不敢大胆放手时，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是冲破了这种约束，搞起许多自发社来；当少数富裕中农发生动摇时，而贫农表现得很坚决，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精神，充分说明了绝大多数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所以我国广大农民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党的正确领导，是合作化运动进行得又快又好的根本条件。这个问题本来是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已经证实了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②可是这两条根本的原理恰恰是右派分子杨思正不可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的。因为他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仇恨党、敌视人民群众，所以，党和人民群众欢庆合作化的巨大胜利，右派分子杨思正却感到是他的阶级的惨痛失败；我们说合作化运动进行得又快又好，右派分子杨思正却说“太快了不巩固”。“太快了不巩固”这是表面文章，言下之意就是：共产党把合作化搞糟了，应该下台；合作化冒进了，应该退回到单干的老路上去，让资本主义最终复辟。看吧！这就是右派分子杨思正反

①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18—19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党反社会主义的嘴臉！

再說，合作化是不是冒进是不是巩固，最根本的标志在于合作化后是不是促进生产力迅速的发展。如果說是冒进了，那就意味着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不适合当时生产力的性质，不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然而事实恰恰相反，1956年是全国基本合作化的头一年，这一年的自然灾害很严重，但是粮食产量比丰收的1955年还增加了150多亿斤，除灾区外，有80%的社員增加了收入。今年农业增产速度更是古今中外俱无的奇蹟。全部夏粮比去年增产800多亿斤，小麦总产量已經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各种作物的高产卫星一个高过一个，同时还在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大面积的高額丰产田，例如广东省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00多斤，提前九年，超額1倍实现了农业纲要指标。总之，农业增产的速度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十甚至百分之几百。这些惊天动地的奇蹟，是党领导了广大农民群众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豪迈气概下，大搞水利和积肥的结果，是全力推行先进經驗，革新农具，采取增产措施，并且和自然灾害作頑强斗争的结果，而大力兴修水利，大规模积肥，推广先进經驗等等，又必須以合作化为前提条件。只有合作化，才能发挥集体的力量发揚群众的智慧，难以想象处在小农经济地位終日为生活而担憂的个体农民，能够象今天这样敢想敢做；也只有合作化，才能在大規模經營的公共经济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土地、統一进行规划，并且逐步地实现农田水利化，耕作机械化。这一切說明了农业生产高潮是以全国基本实现合作化为前提的，

說明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而在农业生产大跃进和 5 亿农民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巩固、調整了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轉变为人民公社,标志着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与发展,标志着合作化运动取得新的更巨大的胜利。因为广大农民群众在农业生产大跃进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組織起来的优越性,为着加速建設社会主义,他們自动地打破了县、乡、社的界限,不分城鎮与农村,不分山区与平原,不計較个人的利害得失,組織了大規模的社会主义大协作。在这同时也暴露了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規模,已經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为了农业生产更大的跃进,为了在农村中广泛地发展工业,为了加速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广大群众积极要求进一步組織起来,把小社合并为大社。因此当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后,很快就在全国範圍內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人民公社是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工、农、兵、学、商合一的社会基层組織,它比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規模更大,公有的范围更广,更便于有計劃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財力,有可能实现并且正在实现农田耕作制度的大革命,把广种薄收改变为少种、高产、多收。各地正以不断革命的精神,提出了明年产量翻一番至几番的宏偉目标,爭取在更短的时间內改变經濟上落后的面貌,使全国 6 亿人民都能享受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

农业合作化后新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上,而且表现在工业生产的大跃

进上。我們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是互相促进的，特别是在我国情况下，农业在国民經济中占很大的比重，因此农业生产的高潮推动了工业生产的高潮，这也是和全国合作化的胜利相联系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必須先有合作化，才能使用大机器。事实証明，正是大規模經營的大集体的农业經济，給社会主义工业提出了新的巨大任务，要求工业部門大量地供应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供应化学肥料，現代化运输工具以及煤油电力等等，这就必然推动了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后，农民兼工人，大办工业，大力支援鋼鉄元帅，更促进了工业建設大跃进。所以合作化运动不仅是关系到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問題，而且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至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大問題。楊思正恶毒地污蔑合作化运动絕对不是偶然的，而是資产階級右派分子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阴谋之一。

七 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二种形式及其性质的反动观点的批判、

右派分子楊思正，公开为现代修正主义喝彩，叫嚣說“他們認為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級形式；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級形式；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矛盾統一，这些理論是完全有道理的。”除公开傳布之外，他还义务地为这些修正主义寻找“根据”，說什么“全民所有制与人民的个人利益沒有直接的切身利害关系，因而不能刺激人們的劳动热情，集体所有制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正确的結合起来，故能發揮劳动者的积极性”。

楊思正的这些胡說，是彻头彻尾的反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馬克思主义認為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高級形式，集体所有制是低級形式。区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級形式和低級形式的标准，主要有两点：第一，应从它們各自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和彻底程度来比較；其次，与上面一点有关的，就是要看它們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如何。

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全体人民的所有制。在国营企业里，一切生产資料和劳动产品都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财产，国家依据整个

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规定企业的全部生产活动(包括生产任务、基本建设、原材料机器设备的调拨供应和劳动工资成本等)和实现产品的分配。因此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化程度最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在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起着主导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它集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全部生产基金中占绝对优势,而且还在于全民所有制的建立与巩固,是集体所有制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集体所有制虽然也是同一社会主义类型的公有制,也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体劳动为基础,但它的公有化程度却不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主要是代表一部分劳动人民的利益,在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中,不但生产资料归合作社所有;它的产品也归合作社。同时在合作社中,除了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化外,还存在着社员的个人副业。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只是在集体的范围内公有化,也就决定了它在计划生产和产品的分配上都具有一定的特点,即合作社的计划,一方面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大程度的经营独立性;合作社的分配,除了完成对国家的收购和税收任务外,其余的按照合作社的章程只在合作社和合作社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生产设备也不能在合作社之间进行调拨,如上海第三五金生产合作社在未转为地方国营工厂前,马达冲床较多,专业联社为了其他合作社的需要,曾几次向他们调拨,但都被拒绝了。转厂以后,成为专业联社的合作工厂,经过规划,该厂主动提出可以调出12台冲床以及其他压床等机具,这对生产潜力

的發揮具有重大的意義，類似這樣的例子還很多。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公有制兩種形式是存在着差別的，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化程度最高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最成熟、最徹底的形式，而集體所有制的合作社則是較低級的形式。

由於上面的差別，就決定他們之間還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雖然不是根本的），這種矛盾一方面體現着國家、合作社積累與農民消費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亦體現着新制度和農民舊習慣之間的矛盾，例如在生產計劃上，國家為了組織整個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避免脫節，必需把農業合作社的農副業生產亦納入國家計劃，這是完全必要的，對整個社會有利，不僅對工人有利，對農民也同樣有利。國家利益與合作社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體執行計劃的過程中，往往會發生國家與部分合作社的要求不完全一致，國家從發展整個國民經濟的需要來看，規定這些地區種糧食作物；那些地區種經濟作物；規定某些地區種這種經濟作物；某些地區種那種經濟作物，但是合作社可能為了自己對糧食的需要，或者依據國家規定的農產品的比價大小，為了取得較多的經濟收入，可能不完全按照國家規定的計劃而生產，從而產生了計劃生產上的矛盾。又如，在統購統銷政策上，國家為了調節供應，穩定物價，保證生產和全國人民食用需要，採購機關就要求多購少銷，而合作社為了更多地滿足自己局部需要，就易產生少購多銷的要求，這也體現了新制度和農民舊習慣之間的矛盾，其他如農業稅收；分配問題；農產品收購價格問題上也都會產生一定的

矛盾，但必需指出所有制两种形式之間的矛盾都是属于人民內部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可以通过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来及时地調节，以及通过不断地提高人民的觉悟而加以克服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在生产問題上，一方面，合作社經濟要服从国家統一經濟計劃的領導，同时在不違背国家的統一計劃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經營的經濟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計劃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計劃。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需兼顧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需处理适当，經常注意調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們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可見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形式之間是存在矛盾的，問題在于要善于发现矛盾，并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这些矛盾是能够克服的。但是要最后消除这些矛盾，只有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条件的成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乃是必然的趨勢。举例來說，到1958年6月底为止，上海市已有263个手工业合作社、組，22,000多从业人員轉为85个地方国营工厂，76个合作工厂。手工业合作社轉为工厂乃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規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結果。一方面是在社会主义建設、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形势

的推动下，为了贯彻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需要充分利用手工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合作社社员通过整风整社，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都自觉自愿的要求转变所有制。

手工业合作社直接发展为地方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也就是把集体所有制发展为全民所有制，或者在集体所有制中扩大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与比重，结果，对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推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可以充分利用手工业的生产潜力，达到投资少、收效快的效果；还便于技术力量、厂房设备、资金、劳动力的统筹安排；而且，合作社转为工厂以后，实行了工资制度；并开始筹备组织工会；也可以享受劳保等待遇，这使社员们感到转变为工人阶级具有无比的光荣；感到自己生产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积累，认识到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当前技术革新运动。

至于农业方面，在今年短短的8、9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由于1958年社会生产力猛烈地发展，迫切要求调整原有的生产关系与它相适应的结果。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曾起着巨大的作用，但由于1958年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之后，就愈来愈暴露出原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首先表现在原有的规模过小与高速度地发展生产不相适应。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只有一、二百户至数百户，社

小、人少、地少，且土地分散，这样就同兴修水利、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及其他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相矛盾，同时不能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开展大规模的协作，有碍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其次，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单一的农业生产组织，它与全面发展相矛盾。在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尚存在私有制的残余，如社员的自留地、私有的果园以及私有的小型农具等等，这些私有制的残余亦与高速度发展生产相矛盾，同时，由此还会产生资本主义思想，从而亦会影响到公共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说明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已不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随着生产的全面大跃进和党的正确领导，广大农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大大的提高必然就产生了人民公社。

目前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但它在规模上比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而且包括的范围广。它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全面结合的社会基层单位，它本身就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这种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所以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好形式。

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力的证明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生产关系的这个改变，反过来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

由此可见全民所有制乃是集体所有制发展的方向，它是比集体所有制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右派分子妄想

修正这个馬列主义原理,真是枉費心机!

右派分子楊思正还无耻的叫嚷:“全民所有制与人民个人利益沒有直接的切身利害关系,因之,不能刺激人民劳动的热情;集体所有制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正确的結合起来,故能發揮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完全是歪曲和污蔑。

首先,他恶毒的将我們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大家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个人之間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国家的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生产資料公有化,从而消灭了一切剝削,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充分地滿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一切劳动成果不論是个人的消費品或公共财产都是劳动者所享有,因此,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之間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根本上一致的,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謀福利;只有整个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有所增长,个人的利益才有保証,我們深深懂得当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應該坚决服从国家、集体利益,因为国家和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最高体现和无穷源泉。我們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它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全力以赴的奋斗目标,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我們的国家与人民之間存在着血肉般的切身的利害关系。当前全国人民都在鼓足干劲,忘我劳动,全力貫徹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这样,我們将在最短时期內超过英国的同时,我国几千年来一穷二白的局面也将永远消灭,全国人民的生活就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里国家的全民的利益也就是我們每个人的最大利益,这就激

勵着全民同心協力，全力以赴趕英國。

其次，在全民所有制的範圍內是不是不能刺激人們的勞動熱情呢？這裡楊思正是指物質利益原則而言，在這個問題上，楊思正一方面把社會主義生產的動力完全歸結為物質利益原則，這是污蔑！另一方面又否定全民所有制中存在着物質利益原則，大家知道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是適合生產力性質的，這種新的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推動者。

第一，因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使生產者永遠擺脫了剝削，根本改變了勞動者的地位，勞動者成為生產的主人，因此他們對於勞動成果產生了積極關心的態度，公有制使社會和個人，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關係結合成為同志般的友愛、團結和互相協作的共產主義關係，這種關係能夠充分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使之自覺的展開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這一切都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高速度發展的强大動力。

第二，社會主義社會為技術的全面發展提供廣闊的前途。因為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而達到這一目的，就需要不斷採用新的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技術的高速進步，全面發展決不會受到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那種矛盾的限制，這樣技術的全面進步必然保證生產力的高速發展。

第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保證了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在實行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沒有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因而根本沒有危機，生產不會遭到中斷，人力、物力、

財力能最充分最合理的使用，这就保證了社会主义生产直綫的高速度增长。

由此可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正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无穷无尽的动力。

再說，社会主义事业到底有沒有貫徹物質利益原則呢？回答是肯定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按劳分配原則，而按劳分配規律正是体现了物質利益原則，因为它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結合在一起，这点起碼的知識，楊思正如果不是无知的話，那末其用心是可想而知了。

同时必需強調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高涨，主要是依靠党的正确的领导和經常的政治思想教育；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和共产主义风格的发揚。在我們国家里，广大劳动者积极地忘我的劳动是因为他們具有远大的理想：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的幸福；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早日建成；为全人类的最后解放，而絕不是为了一点追加工資或超額奖金，如果按照楊思正的說法，全民所有制与人民的个人利益沒有直接的切身利害关系，不能刺激人民的劳动热情的話，那末为什么現在各个生产战綫上都掀起了空前的大跃进呢？是什么在促使生产指标一翻再翻呢？为什么在大跃进中工人能自覺提出“要政治挂帅不要鈔票挂帅”；提出增产不增工資、取消計件工資的要求呢？难道都是为了个人的打算嗎？右派分子楊思正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的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不能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

根据以上种种的分析，可見右派分子楊思正所謂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級形式的說法，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他企图以此根本上反对全民所有制，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向更高級的共产主义过渡，他妄想違反社会发展的規律，使历史向后倒退。我們深深懂得所有制問題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問題，否定了全民所有制就根本談不到社会主义，因此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我們一定要在政治上、理論上和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之流展开堅決的斗争，以彻底粉碎他們的反动謬論，堅決打垮他們的罪恶阴谋。

駁斥右派分子楊思正、王士章
在经济方面的修正主义谬论

跃 青 編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